

# 公开政府招待费 还需跨过几道槛

## 核心提示

公开政府信息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也是构建民主法治社会的重要举措。将公共权力运行情况主动置于阳光之下,体现了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让公众感受到我国构建阳光政府的决心,政府及时公开信息的举措最大限度地赢得了各方面的支持与理解,能够有力地推动事件的解决。从5·12汶川地震到毒奶粉事件,从阜阳手足口病事件到杭州地铁工程塌陷事件,政府信息公开的力度与效率越来越明显。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今年5月1日公布实施。根据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3条规定,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最近,合肥市一位普通市民把两份要求政务公开申请书递交给了合肥市财政局和合肥市审计局,要求公开政府各部门招待费等信息。据了解,这位市民是今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合肥市向政府部门提出此类申请的第一人。

随着政府信息公开力度的加大和公民主体意识的加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个人或组织向政府部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政府信息的公开范围将会越来越大,那么备受公众所瞩目的政府招待费、办公经费等“敏感”地带是否应公开,以何种方式公开?如何保障公民依法申请信息公开的权利?这些随之而来的问题考验着条例的可操作性,也考验着政府的公信力与打造透明政府的决心与勇气。

## “我想知道政府的钱是怎么花出去的”

11月23日上午,合肥市民章先生按照合肥市政府信息公开网的提示,在网上填写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并分别发给合肥市审计局和合肥市财政局。在要求“公开内容”一栏中,他填写:合肥市政府公开各部门、各区县政府2007年度发生的财务账目信息,包括财务预算、财务决算、全部经费来源及全部经费支出,包括办公费、招待费、差旅费、单位事业性经营收入等财务账目。

章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只是想通过自己的这种做法,让公民知道自己的权利,让公仆知道群众的监督。”

政务公开 漫画/邱炯绘



无独有偶,在此之前,辽宁沈阳市民温洪祥向沈阳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和市政务公开办等部门递交了一份《沈阳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市政府各部门和各区县(市)政府公开招待费、差旅费、办公费、单位事业性经营收入等财务账目以及政府各部门年度财务审计结果。他表示,政府财政收入源于纳税人,“作为一名公民和纳税人,有权利知道每一笔钱是如何花掉的。”温洪祥因此成为全国首位向政府部门提出公开财务信息的人而备受瞩目。

虽然人们想了解“家底”的愿望迫切,但是事实上普通公众包括递交申请的人,他们在表达和行使这一权利的同时,内心深处对政府公开招待费信息的结果还是持观望态度。正如合肥的章先生告诉媒体记者的话:“一开始并不能确定合肥市政府能否公开这些账目,因为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成功的先例。”而合肥一位网友认为章先生向政府部门提出公开招待费申请,客观上反映了公众民主法制意识的增强,其勇气令人敬佩,但他对于该申请的结果并不乐观。而直到目前为止,并未见有接到申请的地方政府部门按照条例公布相关财务信息。

## 以私权制衡公权 是治疗腐败的良药

政府信息公开的背后,寄托着人们对廉洁高效政府的热望,和对官员腐败现象的痛恨。

经验证明凡是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总是易于藏污纳垢。最近,一份公务员出国考察费用清单据说被某人无意中捡到而后在网上曝光,打着人力资源考察的旗号,花着纳税人的钱,江西新余、浙江温州的某些公务员们把拉斯维加斯、夏威夷甚至“同性恋双峰山”这样的景点都进行了实地考察。令公众气愤的是甚至连出国邀请函,都是当地政府某些部门高价购买而来。目前事件已被查实,相关责任人受到了相应惩处。

国家三令五申制止官员公款旅游,然而这一次如果不是考察清单因偶尔失误被曝光,不难想象,那些用纳税人的钱花天酒地游山玩水的政府官员依旧心安理得地享受这样一种“隐性福利”。

向纳税人公开政府信息实质上体现了以私权制衡公权,从而避免公权力泛滥的一种手段。“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政府的行政行为为远离公众的视线,长此以往一些有损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行政行为自然会暗中滋生,事实证明制止行政腐败现象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行政行为的透明公开。

在今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提出的《关于建立行政成本信息公开与监督机制的建议》提案中,该提案数据显示,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一方面群众不清楚这么高的行政成本是怎样开支的,另一方面打着出国考察的旗号公款旅游的事件时有发生,政府的公信力与形象因此被抹黑。

其实向纳税人公开政府公务费用在国际上早有先例,90年代中期,日本高知县的一名律师就以纳税人的身份,要求县政府公布有关招待费的具体开支情况,遭到政府拒绝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据地方政府情报开示法,命令高知县政府公开有关开支情况。最终法院判决原告胜诉,并从相关公务员手中追回四亿日元招待费。

人民网11月17日至24日“每周网友热评排行榜”上,“公开政府招待费,难度到底有多大”的评论话题高居排行榜第二位。政府的办公费、招待费等公务开支备受人们关注由此可见一斑。

条例的颁布客观上为人们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从为数不多的申请案例来看,似乎成功的例子很少。“由于国内还没有先例,政府部门财务信息比较敏感,公开这些项目可能不会一蹴而就。”沈阳市政务公开办相关负责人曾这样答复媒体记者。由此可见,公民依法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道路决非坦途。

## 政府公开招待费 还需跨过几道槛?

无论申请公开政府招待费的结果如何,合肥市民章先生、辽宁沈阳市民温洪祥在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化过程中无疑



具有标本意义。全面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工作是一项全新的系统工程,因此在具体的实施上还有很多需要跨越的“门槛”。

首先从“官本”到“民本”还要假以时日。不可否认,长期的官本位思想和机关官僚作风依然存在,公开政府相关信息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某种权力的削弱,政府官员观念的转变绝非一日之功。其二,条例某些方面还有待在实施中完善:如在具体信息公开范围的进一步明确上,在公民申请信息的权力保障上,在信息公开机构职责进一步明确上,公民主体意识的培养。随着我国民主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公民的参政议政的热情在逐步加强,然而如何行使公民权利,在推动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中发挥能动性,公民意识与公民素质无疑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认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公民依法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体现了公民政治素质的提高和我国民主政治的进步,各级政府都应积极转变观念,鼓励公民依法有序参与政治,表达民意。同时,应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体现了政府的善意,但真正破除各级政府官员的观念壁垒,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特别是保障公民依法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实现,还需各项制度的跟进。 据新华社



# 新闻时评

## 加大对医疗教育的投入 究竟有多难

10月14日,《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布,并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新医改方案能否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新医改方案最需要什么的关键何在?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赖平耀教授称:“看病贵、看病难”的根本症结在政府投入严重不足。(见12月8日《中国经济周刊》)

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导致“看病贵、看病难”,这一问题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明白,且都有深切的感受。然而,用数字讲话,是专家学者的强项。赖平耀说,从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到现在,政府财政投入在全部医疗支出中所占比重仅为15%-18%左右,占GDP不到1%。而发达国家对公共医疗财政投入则占GDP近8%。这一数据不禁令人愕然:用于民生的公共投入如此可怜,那么,大量的投入都到哪里去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日前在出席“2008首届全球管理论坛”时表示,中国经济内部失衡,具体表现是过度投资和国内消费不足,投资占GDP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0%左右不断提高,目前已提升到45%左右。报道说,2007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均超过2万亿。而发达国家在医疗支出占GDP比重与住房投资占GDP比重大致相当,但在中国,后者却是前者的10倍以上。——基础设施等面子工程的投资与民生的投入如此之不平衡,实在令人咋舌。

具体到医院而言,政府投入不足的直接后果便是导致医院的方向发生根本的改变,从以“救死扶伤”为职责变为追求收入最大化,最大限度地提供更多、更贵的药品与医疗服务。医院内医生的收入也实行同创收挂钩,其中一半以上是通过从患者身上“创收”得到的。这不仅导致了医患矛盾,更令社会风气出现严重恶化和倒退。

多年的医改实践告诉我们,将公立医院简单地推向市场,让医生的收入依靠从病人那里创收来保证,是政府摆脱社会责任的表现,也必然导致医院将“救死扶伤”的天职抛到九霄云外。事实证明,政府这种甩包的不负责任的做法根本行不通。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医患矛盾突出的问题,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政府必须加大投入,最起码要对医务人员的工资收入与固定资本支出提供完全的财政保障。

做到这一点难吗?我国的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和公款旅游等“三公消费”每年达9000亿之多,占GDP30%。1/3被挥霍了,如果,从中挤出一半,甚至1/4,用于对教育、医疗的投入,那么,老百姓砸锅卖铁供孩子上学,病人家属动辄向社会求助的现状就会得到极大的改善。显然,所有这一切,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只要政府切实负起责任,“只要削减行政与经济建设支出,便能够大幅度提高政府对公共医疗服务的财政投入”,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肖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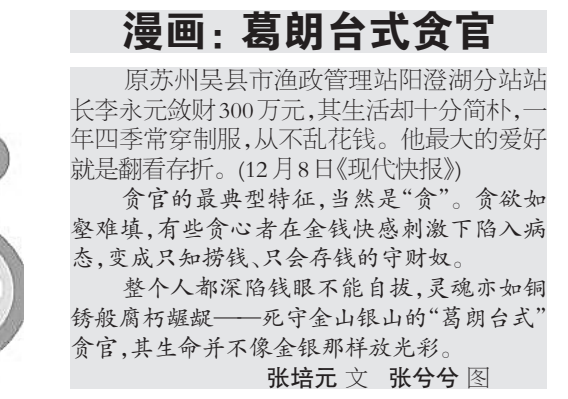
## 很人性化也很温情

明年1月1日前,所有公交车厢中必须保证10%的座椅为“老幼病残孕”专座,如果不达标或位置不对,车队要对公交车内座椅进行重新安装。此外,为了保证老年人在车厢内安全,老人上车后没有找到座位前,司机不得启动车辆。这是北京市公共交通集团就提高对老年人服务标准拿出的新办法。(12月9日《京华时报》)

人就会老,这是每个人都抗拒不了的自然规律。社会要进步,就必须对老人好,而每一个尚不是老人的社会成员,也要善待老人。“老幼病残孕”,皆需要社会的保护,他们是自我保护能力差的弱势群体。

没什么难度,看是小事,却功德无量。文明是个循环系统,这个系统也需要老人的自觉加入,自觉维护。譬如,在上下班时间,公交运行的高峰期,老人如没什么急事,能不出行就不要出行。人家既然对你老人好,老人也要自爱、自重,对别人也好。

北京市公共交通集团出台的新举措,很显人性化。其他城市的公交部门不妨效法一下,复制一下。甚至到别的公共服务领域的人们也可以见贤思齐,学一下北京市公共交通集团的做法,拿出相应的服务老人的办法。 伊文



## 官员泡沫的制造

“十羊九牧”是个很古老的说法了,《隋书·杨尚希传》就载:“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官多,并不意味着干正经事的增多了,官一多,行政效率势必更加低下,也意味着赋税加重,老百姓的日子更加难过。官一多,便令不一,人浮于事,还会让下面干具体事的人无所适从。

现在,官员“十羊九牧”到什么程度,官员的制造泡沫到什么地步,网民们和媒体有了新的发现:继网传铁岭市有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新乡市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后,日前又有网民曝出困县湖南平江县有10个副县长4个县县长助理,记者随后浏览这位网民提供的平江县官方网站,确认了这一事实。《新快报》12月4日)

在现代社会,政府机构无非是替公众服务的工具,而不是一些人置放私欲、攫取利益的所在。作为替公众服务的工具,政府机构理应有个适当的规模,人员是越精干越好。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机构才有可能向公众提供优良的公共产品,显现公共权力本质的一面。这些年来,政府机构为何会越精简越多,以至臃肿到不认的样子?细究起来,还不是一些人钻现行法律法规的空子,在一些职位上硬性地去安插人?大政府、小社会,就会制造出臃肿的官员泡沫。受私利驱使,某些官员就会把副秘书长、副县长弄一堆这样的事做到极点,使其达到最大化的效果。

事情的正常不正常,存在一个从哪个角度看的问题。当不正常的事情变得正常时,正常的事情反而看着有些不正常了。譬如,平江县搞了10个副县长4个县长的助理的位置,其他地方也群起而效之,这正常与不正常的关系,就会被搞混乱了。而且,这也就牵扯到是非颠倒的问题了。

机构臃肿,副职成堆,不是什么好事,这应视为政府机构出现的乱象。它折射出了部分官员思维的低级、鄙陋及行政水平的低下。精简机构、精简人员,越精简倒是越多越乱,这像是一种讽刺。泡沫化的副秘书长、副县长们仅以职位的设置就占有了大量的财政资金,实际上是在白白地浪费着纳税人的血汗钱,直接侵犯的是公众的利益。 今语

## 权力有病 才以上访者为精神病

今年10月,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时,被镇政府抓回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被放出。记者调查发现,在新泰,因上访而被送进精神病院者不是个别。相应医院承认许多“病人”是上访者。而当地政府表示信访压力巨大,若出现越级上访,会上级处分。(12月8日《新京报》)

在这一事件中,那些身穿白大褂的精神病大夫们是值得“祝贺”的,因为他们的效益必然会因为上访者精神病人的出现而行情暴涨。但更应该“称颂”的还应当是某些基层官员们,似乎可以推论,在“牢固树立依法打击的意识”之后,他们又找到了“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的终南捷径,省级信访先进单位算不得什么,河清海晏的大治盛况也指日可待。将上访者“鉴定”为精神病人,再送他们到精神病院接受捆绑、电击之类的强制治疗,人文关怀何其“温情”,息访维稳的效果又“何其卓著”。

然而,那些上访者并不是精神病患者。即便其中有精神病人,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申请司法鉴定和送医强制治疗的也只能是他们的亲属,而绝不可能由地方政府越俎代庖。农民孙法武如果真的是精神病人,为什么他写下一份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就能被放出?种种骇人听闻的细节只能说明,在某些基层官员那里,所谓精神病送院治疗绝不是一种福利,而是一种变异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和惩戒方法。正常的信访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不可能有法律法规对这样的权利进行干涉或设定惩处方法。

把上访者诬陷为精神病人以限制其人身自由,并强制他们接受精神和肉体的惩戒,这只能是少数地方官员独出心裁的创造。它可以不畏人言地写入经验材料,但显然无法自证其合法合理或合乎道德。没有谁愿意舍弃亲人放弃事业上上访路,几乎每一个上访者都有他们无奈的遭遇。孙法武的赴京,起始于征地补偿的不公,加剧于儿子的无端被砍成重伤,他不过是为了求得一个公平的结局。而不不停奔波的结果,不是事情的解决,而是拘留、劳教直至莫名其妙地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让人惊悚之处还在于,孙法武的遭遇不是特例,而是“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

上访者满怀希望去向政府申诉,说明他们依旧对制度充满了信任。但某些地方政府却早已忍耐不住,开始以逾越法律边界的手段来回应这些上访者。他们的理由仅仅是怕受上级处分,而上访者遭遇的却是被限制自由,被强制吃药打针。一切精神病患者所需要的惩戒性治疗,都会加之于本是健康人的上访者身上,他们有口难辩欲哭无泪。这是一个恶劣的开端,权力如果可以在自由的程序与实体之外,只以精神病的说法就拘禁人的自由,摧残人的精神和身体,那么没有谁不会为之惊悚不已。今天的上访者,未必不会是明天的另外一群人。

再有20多天时间人们将迎来建国60周年的2009年,最大多数的民众真心期待国家繁荣、社会安宁。这也必然要求我们警惕那些不和谐因素,少数近乎癫狂的权力就是其中最刺眼的。 周东飞